

梁启超对晚清探索精神的塑造与新小说

孙丽秀* · 吳淳邦**

第1節 緒言

第2節 茫大海飘来一叶孤帆：《十五小豪杰》

第3節 新时代精神的探索者和塑造者：梁启超

第4節 探索精神的文学表达：新小说

〈국문초록〉

梁啓超로 대표되는 清末의 선진지식인들은 사람의 정신 개조와 민족정신을 고취시키는데 큰 관심을 표명하였다. 梁啓超는 外國文學의 번역 소개나 자신이 직접 창작한 저술을 통해 새時代의 民族精神을 고취시키고자 하였다. 그는 “新民”을 시대적 핵심이론으로 간주하면서, 民族精神과 時代精神이 국가의 생존과 발전에 중요한 작용을 한다는 사실을 강조하였다. 또한 歐美와 日本 등 선진국가의 思想文化를 도입하여, 現代의 政治理想과 科學精神의 追從과 같은 민족 문화 가운데에서 적극적으로 받아 들일 부분을 찾고자 노력하였다.

梁啓超가 적극적으로 주창했던 ‘新小說’에는 낙후된 현 상황을 바꾸고자 하는 중국인들의 절박한 바람과 이상적인 사회형태에 대한 갈망을 담고 있었다. 특히 선진지식인들은 부지런히 새로운 出路를 모색하였고, 과감하게 신세계를 개

* 主著者: 孙丽秀(张家口学院(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 in Zhangjiakou University) 讲师, 天津师范大学(College of Literature i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文學院博士課程研究生)

** 交信著者: 吳淳邦(天津师范大学 “千人计划” 招聘专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客座教授)

적하려는 熱情과 信念을 가지고 있었는데, 바로 이런 사실이 傳統文學의 구태의연한 내용을 뛰어넘어 문학의 새로운 세계를 창조해내게 되었다.

핵심어 : 량치차오(梁啟超), 만청(晚淸), 신소설(新小說), 탐색(探索), 시대정신(時代精神), 신민(新民)

第1節 緒言

晚淸社会艰难的转型过程中, 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爱国人士率先承担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使命, 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即是最好的例证。封建社会末期的大淸国不再是天下唯我独尊可以安享一隅, 传统文化已经无法解决自身积存已久的问题, “走出去”就成为国人唯一的选择。同时期发生变革的日本通过全盘西化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 逐渐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鉴于这一成功案例, 经历洋务运动失败的国人并没有放弃学习西方的做法, 反而更加热衷于引进西学, 进而引发维新运动。中国在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中屡经挫折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 但是向外界寻求出路, 走向世界成为不可逆转的大势。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 “与外界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 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 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 ……”¹⁾ 林则徐、魏源、姚莹、徐继畲等率先将世界视野引入国内。《海国图志》记述了世界四大洲(亚洲、欧洲、非洲、美洲) 30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和政治状况, 并提出“师夷长技”引发思想界震动。《瀛寰志略》介绍了东西半球的概况和各国的风土人情, 透过西方先进的器物进而研究资本主义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年, 第609页。

强国的经济制度，力图破除中华文明自傲、拒学“蛮夷”的时代偏见，这极大冲击了传统士大夫的心理防线，虽然招致诸多非议，但它们最终被历史所接受，成为后来康梁等维新思想家的启蒙经典。社会的变化终究会淘汰陈旧的观念，迎接新的思想。西学的引进加速了传统社会转型的步伐，为中国社会病态的机体注入一股兴奋剂。

第2節 茫大海飘来一叶孤帆：《十五小豪杰》

在《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十五小豪杰》和《佳人奇遇》双双入选，这梁启超当年仅有的几部翻译文学作品中的两部，“被视为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一百种译作中的两种译作。”²⁾ 根据该书的前言部分介绍入选的标准是译本的社会影响，这两部小说当年的确风靡文坛，尤其是《十五小豪杰》更是轰动一时。《十五小豪杰》由梁启超于1902年翻译成中文。原作是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创作的《两年假期》，一部长篇科幻探险小说。后来由日本作家森田思轩翻译成日文版名为《十五少年》，梁启超的中文版本是从日文版转译而来。这样的小说题材、情节、人物、主题、文体都与中国传统小说完全不同，因此其带来的新鲜感不言而喻，不少人认为《十五小豪杰》的影响力超过《少年中国说》。那么梁启超为何翻译这样一部作品，他在其中寄托了怎样的想法，则需要深入解读。

原著《两年假期》是一部海洋冒险漂流记，叙述了十五个少年游历、冒险、脱险的故充满幻想，情节生动。1896年森田思轩将其翻译为《十五

2) 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第165页。

少年》并在《少年世界》杂志上连载。森田思轩带着启蒙和娱乐的双重目的，译介给青少年读者。他极为赞赏儒勒·凡尔纳科学与想象的结合，认为超它越了时代，将文明和真理引向读者。《十五少年》在日本同样受到追捧，是儿童文学畅销小说，连成人也爱不释手。其中展示的新奇科技、陌生的西洋文明引发了人们的好奇心，从而也引起人们对其背后隐藏的科学和真理的向往。这只是明治以来“翻译热”的一个缩影，这种翻译热的出现是适应“文明开化”的需要，知识分子希望以西洋文学创新日本文化的苦心可见一斑。

梁启超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前国内已经有不少翻译文学作品，而且有不少是从日文翻译而来。据《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³⁾统计，1906年以前，中国翻译的日本文学作品或由日本重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大约有70余种。梁启超认识到要想推进中国近代改革，必须开启民智、重塑国民精神。但重塑民族精神的资源无法在“老大帝国”中获取，从域外借取新的思想文化资源是简捷可行的方法，译介外来文学也是了解域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梁启超在他主持的《新民丛报》上宣称：“一、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光罗政学之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二、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治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⁴⁾梁启超发扬“时务文体”，以犀利通俗的言辞，生动饱含情感的文字宣传着他的政治思想，宣传变法维新、民族主义，弘扬新思想、新学说、新动态以培育新民。其实梁启超办报和翻译创作文学作品的用心皆为“新民”。《十五小豪杰》连载于《新

3) 参见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4) 梁启超，〈本告白〉，《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8日。

民丛报》正是透露了梁启超翻译的主旨和动机。

梁启超的翻译采取了“豪杰译”的方法。豪杰译起源于日本，关于它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但是对其特点的认识还是基本一致的，这种翻译方法不拘泥于原文，译者根据自己的目的和标准对原文的语言内容作出一定程度的删改，是当时不少译者，包括早期鲁迅在内，常用的方法。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传统文学观的影响、译者外语水平有限、翻译的动机以及为适应中国普通读者的阅读水平等。梁启超的翻译还受到日本翻译风格的深刻影响，再加上他的译介动机有很大部分非文学因素，于是《十五小豪杰》就成为“豪杰译”的典型。然而事物总有两面性，大幅度的改写也意味着一种创造，“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它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⁵⁾《十五小豪杰》在读者中间反响热烈，一版再版，侧面说明梁启超的改写是成功的。既然出于“新民”的目的进行改写，那么作品必须适合中国普通读者，又能融汇新知就成为译介的基本准则。《十五小豪杰》采用明清章回体叙述体式，有结构工整的对仗回目，使得读者在阅读之初，就能把握本回的内容，同时也能抓住读者眼球，产生期待视野，激发阅读兴趣。以篇首诗词作为故事的入话，直抒胸臆，容易与读者产生共鸣，实现雅俗共赏。在话本文学中出现的套话也随处可见，例如：“看官”，“话说”，“却说”，“且听下回分解”，适应了多数普通读者喜欢听书的习惯。而每回结束处的概括本回的诗句，是梁启超的一个小小创造。这正是他在“诗界革命”中所倡导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思想的呈现。读者可以在舒适的阅读氛围中，顺其自然地接受新思想。这在当时看来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选择。

另外，梁启超对日文版的章节做了重新分割编排，由此，梁氏的译作

5) 谢天振，《译介学》，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104页。

比日文版多了不少悬念,比如经常在关键处或高潮处戛然而止,情节更加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故事的叙述者以说书人的形象出现,例如:“看官啊,你不必着急,这武安是死不去的,他是这部书的主人公,死了他,哪里还有十五小豪杰呢?”⁶⁾,叙述者经常干预故事的进程,也干预读者的阅读和思考,有意让读者按照自己的视线和视角来理解故事。在故事被操控的背后,读者也不知不觉被叙述者操控,这确实利于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宣传与输送。这种叙述方式对于喜欢听书的中国读者来说,并不会引起反感。

森田思轩原作的语言采用欧化的语体,追求西洋情调,但也倾向言文一致。《十五小豪杰》运用俗语白话,破除了严复、林纾等大翻译家古雅的文言体,推动外来文化进一步向普通读者靠近。然而在翻译过程中,梁启超还是遭遇了文言与白话转换之间的障碍,形成了半文半白的语言。例如:武安向俄敦道:“既是这么着,我们要把这断篷割去,你同杜番二人守着舵轮。莫科呀,来这里帮我。”⁷⁾读起来倒也流畅顺口,又不失文言文简洁典雅的感觉,仍然能感召不少读者。在翻译过程中,梁启超为贴近普通读者进行了各种尝试。形式上的改写,仍然是为了内容和主题服务,这是真正能够打动读者的地方。森田思轩翻译《十五少年》后表示他被感动的原因是书中表达的爱、责任、思考、勇气、坚强。梁启超也积极接受了森田文中“自由”,“服从”,“平等”,“权利”,“义务”,“自治”,“竞争”等反映西洋思想的新名词。⁸⁾

人物是小说的核心要素之一,一般叙事作品需要通过人物及其活动思想来推动情节的发展并揭示主题。原作中“武安”是故事的核心人物,他

6) 儒勒·凡尔纳著、饮冰子等译,《十五小豪杰》,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第16页。

7) 《十五小豪杰》,第4页。

8) 参见范苓,〈翻译文体的选择与创新——明治言文一致文体对梁启超的影响〉,《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2卷第3期,2009年5月,第96—98页。

身上汇聚了作者向往的优秀品质。梁启超译本延续了这一人物设定，在此基础上让人物立体丰满，并融入了更多译者的理念。从题目的改动上看，《两年假期》和《十五少年》都是中性的描述，没有明显的情感色彩，然而梁启超将其译作命名《十五小豪杰》，显然多了很多情感色彩和丰富的想象力。“豪杰”在中文词汇中是一个十足的褒义词，例如：《管子·七法》：“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骏雄。”⁹⁾《水浒传》第十一回：“曾有东京来的人，传说兄长的豪杰，不期今日得会。”¹⁰⁾毛泽东《冬云》诗：“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¹¹⁾总结豪杰一词的含义包括：出众、勇敢、有气魄、放达、有影响力之意。中文语境中一般被用于称呼英雄、侠客等杰出人物。梁启超将他的小说中人物称为小豪杰，读者自然可以领会译者理想的人物就是这种少年英雄。例如梁氏笔下的“武安”拥有沉稳、勇敢、智慧、侠义、进取、追求自由的品质。在集体遇到危难时他能指挥若定：“武安慢慢地翻起身回答道：‘不要紧哩，俄敦。’连忙又向那一个说道：‘杜番啊，我们不要灰心哇。我们须知，这身子以外，还有比身子更重大的哩！’”¹²⁾武安还是一个见多识广的少年：“武安曾从欧洲来到澳洲，经过大西洋、太平洋两个大海，因此也学得些船上的事体。”¹³⁾武安是“满校人都敬重他，”¹⁴⁾但是也有“四小豪杰”（杜番、韦格、乙菩、格罗士）向来不佩服武安，但终被武安的大义凛然所感动。

引进外来文学作品时，作为译者是有所选择的。在国力衰微，西学东渐，维新失败大背景下，最紧迫的问题乃是救亡图存，中国知识分子期

9) (春秋)管仲著/梁运华校点：《管子》，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8页。

10) (明)施耐庵著，(清)金圣叹评，《水浒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72页。

11) 毛泽东著、徐涛编著，《毛泽东诗词全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50页。

12) 《十五小豪杰》，第2页。

13) 同上注，第4页。

14) 同上注，第18页。

盼能从外界采撷有益的资源弥补自身的不足，他们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正如《释新民之义》所言：“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¹⁵⁾ 当时，《十五少年》及其原作《两年假期》都是风靡文坛的科幻冒险作品，无论人物、内容和思想主题都新奇而富有明显的现代气息，堪称经典。

梁启超选择这部作品同他的维新思想和新文学理念是比较吻合的。详细梳理《十五小豪杰》这部译作，可以发现其中容纳了诸多梁启超所崇尚赞美的时代新元素。文中扑面而来的异域风土人情、现代社会生活、西洋器物、科学知识，好似为读者打开了一个百宝箱；作品中性格各异的人物也让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们大感新奇，例如：目中无人但学习优异的英国纨绔子弟杜番，为人静和有思虑、勤勉有才智的英国少年巴士他，才干锐利、却幼年丧母、但远虑有常识的俄敦，最顽劣、好欺嚇同辈、无所事事、但登上“罗胥”号船后谨厚寡默的工学博士之子佐克等。他们遇难漂流一绝岛上，为了生存开始了艰难的探险，遇到无数凶险。少年们被迫在此定居，但是，他们的群体生活却过得有声有色。他们提议选举总统来管理岛屿，并且强调需要贤明的人做，于是，俄敦当选。俄敦规定了每天学习的时间，年长的教年幼的孩子，每周有讲习会，大家讨论问题，集思广益。他们种植蔬菜水果，狩猎，学会用海豹油照明，开音乐会，大家各尽其职。他们性格各异，曾发生大大小小的纷争，甚至曾经分裂，然而最终同心协力战胜来犯的倭东们。十五位少年在长达两年的历险中，没有任何援助，能成功脱险，并且磨练了意志，增长了才干，成为真正的小豪杰。

未成年人作为文学作品的主角，在传统中国小说中是绝少出现的，出于“敬天法祖”的文化观念，传统文学作品中的主角总是年长而德高望

15) 梁启超，《新民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9页。

重之人，他们身上有传统文化所看重的稳重、保守、丰富的人生阅历。而传统文化的这些优势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历程中恰恰成为其崛起和发展的最大障碍。西方国家近代的迅速崛起靠的是敢于开拓、不畏艰险、勇于创新的精神。无疑梁启超的这部译作与中国人固有的传统观念存在着深刻的对立。如果读者以猎奇的心态将其当作神魔小说阅读，就难以领略作品中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和梁启超译介这部作品的良苦用心。梁启超的用意在于：“故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末由。”¹⁶⁾而且梁氏接受了进化论和线性的时间观，将希望寄托于未来，“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¹⁷⁾下一代青年人幻化成为他心目中“新民”的典型形象，于是，青少年成为他维新大业的主角也就顺理成章，“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¹⁸⁾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极力赞美少年如：“朝阳”、“乳虎”、“侠”、“戏文”、“泼兰地酒”、“珊瑚岛”……。显而易见，梁启超看重的首先不是人的知识、阅历、地位等，而是少年形象特有的朝气蓬勃，充满希望的精神内涵。

梁启超所向往的西方新科技和先进社会制度等新世界的元素在小说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地理知识、气象知识、动植物知识、航海知识、科技发明等自不待言，西方的教育制度、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也一一呈现。梁启超在《释新民之义》中谈到：“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¹⁹⁾《十五小豪杰》

16) 梁启超,《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新民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7页。

17) 夏晓虹,《少年中国说》,《梁启超文选》上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249页。

18) 同上注,第254页。

19) 梁启超,《新民说》,第9页。

正符合梁启超开启民智、塑造新国民的理想主旨。写于1902年的《新民说》是其启蒙思想影响最为深远的代表作。涉及关于新民的16个论题,包括:论公德、论私德、论国家思想、论政治能力、论进取冒险、论权力思想、论义务思想、论自由、论自治、论进步、论自尊、论合群、论生利分利、论毅力、论尚武、论民气。可以发现,“新民说”的所有论题均或多或少于《十五小豪杰》得到形象的呈现。对少年的塑造培养是产生理想国民的关键,但是不能狭隘地理解梁启超的说法,《少年中国说》中有一句话:“西谚有之曰: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然则国之老少,又无定形,而实随国民之心力以为消长者也。吾见乎玛志尼之能令国少年也,吾又见乎我国之官吏士民能令国老大也,吾为此惧。”²⁰⁾梁氏对少年与否的界定,不是年龄数字,而是一人一国是否拥有少年之精神。小说中武安、俄敦、杜潘等人乐于探索自然、遇险后积极自救、发明各种器物、建立共同生活制度完善的小社会,最终战胜敌人回到家人怀抱的故事,其动人之处就在于这些少年身上敢于挑战的勇气和认真研究的精神品质,这也这正是国人缺少,梁启超渴慕的宝贵精神财富。“武安独自凫水上岸,预备普渡同人,却被绞落盘涡里去,不见人影。”²¹⁾“此地有许多松柏桧桦、山毛榉等树,判断这里在新西兰南,他们决定先要往北岸高岬探望这地方的形状,武安与莫科做衣服,准备御寒,其他人钓鱼狩猎,……武安探险:全是凹凸的堆石及蒙茸的海草团,跋涉困难,不可言状。”²²⁾“杜潘接口道:‘选总统亦可,但需限定任期,或半年,或一年。’武安道:‘不过任满之后,倘再被选,仍得复任。’”²³⁾

这样的描写将少年敢于拼搏、勤于思索的品质生动形象地传达给读

20) 夏晓虹,《少年中国说》,《梁启超文选》上集,第253页。

21) 《十五小豪杰》,第22页。

22) 同上注,第29页。

23) 同上注,第61页。

者。梁启超翻译此书的目标读者是青少年，然而书中所包蕴的丰富性，使其成为一部老少咸宜的佳作。作为近代文学早期译介过来的西方文学作品之一，正如进入暮年的著名作家端木蕻良回忆：“《十五小豪杰》……虽然我长大以后，没有再看过这篇小说，但它在我的记忆中，却始终未曾消失过。”²⁴⁾《十五小豪杰》成功地征服了无数读者，也深刻地影响着后来的文学创作。

第3節 新时代精神的探索者和塑造者：梁启超

同一社会的成员往往有共有的信仰、价值标准，久而久之，这些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氛围，折射出一时一地的社会文化状况，并最终汇聚为时代精神，即“文化的思想习惯”或“文化氛围”。²⁵⁾认识一个社会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时代精神的问题。如果我们用时间的概念来概括晚清，她是一个末世与未来过渡交替的时代，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动的世纪，这个时代既充满了冲突，又在发生交融，社会机体内部进行着复杂多向的运动，然而终究会形成一个新的走向，新的时代精神也必将形成。

晚清社会的真实状况要复杂的多。晚清处于封建社会的末端，近代社会的开始，而最终的走向是现代社会。由于外部因素的强烈干预，以往中国社会的治乱循环被无情地打破。面对剧变，国人措手不及，大部分更趋于保守，对一切外来之物充满警惕和抗拒，而另外一小部分，却敢于接触甚至追求新鲜事物，双方形成对立并存在激烈的对抗。因而，这一过

24) 端木蕻良，〈《十五小豪杰》和我〉，《民主》11期，1995年，第24页。

25) 这里的时代精神说法来自美国心理学家舒尔茨和E·G·波林。

渡显得复杂而艰难。外来的武力征服和内在的衰朽没落，使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亡国灭种的焦虑和危机，然而也前所未有的激发出国人民族国家意识和振兴中华的雄心。面对自身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别无选择，只能奋发图强。

甲午战争以前，清朝的统治已经积聚了诸多问题，以阶级矛盾为中心的各种社会矛盾持续无法得到解决，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良性运转。清人领略了西洋科技的神奇，认为西方的强大根本原因是先进的科技，于是在19世纪60年代进行了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挽救清朝统治的自救运动，建立了早期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即洋务运动。然而洋务运动没有触及政体，所以这场以强国为目标的运动随着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失败了，甲午战争打破了清人的良好愿望。但这场失败不仅没有击退国人振兴中华的雄心，而且促动了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这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将变革的历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因为，维新变法的根本是以君主立宪为核心的政体变革，触及统治者的地位和权力，这是经济变革的力量向上层建筑传导的必然，但是，当时国内的经济远未达到西方的发达程度，所以变法以失败告终。然而中国就此踏上了不断变革的历程。

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现引进西洋科技容易，但破除僵化保守的思想文化却是异常艰难，例如，地球圆形说已经在国内被广泛接受的时候，叶德辉²⁶⁾竟然依旧顽固地维护“中国中心论”。于是，思想革新成为此后康梁政治变法的重心。新事物的发现是否被人们所接受“要受到当时、当地的文化思想习惯的限制，也就是时代精神的限制。”²⁷⁾

26) 参见[清]叶德辉，〈与南学会皮鹿门孝廉书〉，收入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年，第649-650页。

27) E·G·波林著、高觉敷译，《实验心理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页。

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未必见到过这样的说法，但时代精神即思想习惯的实际作用却是如此，如果没有开放而理性的思想作为基础，人们很难接受新的事物，并面对延续数千年的古老国家发生如此巨大的改变。如何在人口如此众多又保守的国家进行思想变革，是康梁等人面对的难题。

梁启超对于新文化和新思想的践行最值得关注。梁启超大半生都在苦寻救亡图存的强国之路，引领思想文化界前行。胡适曾评论梁启超：“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吾国人士之所以知民族主义思想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²⁸⁾当时的读书人“无论赞成或反对的，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洗礼的”。²⁹⁾梁启超有多元化的知识和开阔的视野，他放眼世界的第一道目光聚焦于日本。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这次“断发胡服走扶桑”³⁰⁾更坚定了梁氏变法的主张，并且他在日本期间更加活跃。忙碌的政治活动之外，梁启超为更多获取西学知识而积极学习日语，为向国人传播西学，他翻译各种书籍数千种。梁启超在翻译的过程中逐渐将目光转向文学。因为他发现小说可以突破旧文化的森严壁垒。他说：“西国教科之书最盛，而出以游戏小说者尤多；故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盖以悦童子以道愚氓，未有善于是者也”。³¹⁾早在1897年天津就《国闻报》连载严复、夏曾佑的〈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其中写道：“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捷，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³²⁾当年康有为也曾在《日本书目志》卷十四中说：“仅识字之

28) 胡适，《藏晖堂札记》，上海：上海东亚图书馆，1939年，第122页。

29) 郭沫若，《少年时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12页。

30) 梁启超，〈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新民丛报》第一号，第109页。

31) 梁启超，〈蒙学报演义报合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6页。

人, 有不读‘经’, 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 当以小说教之; 正史不能入, 当以小说入之, 语录不能喻, 当以小说喻之; 律例不能治, 当以小说治之”。³²⁾可见, 三人的核心观点是一致的。当时持此观点的知识分子不是个别人, 许多思想文化界同仁均给与高度认同。1902年“小说界革命”的发生也就顺理成章。梁启超的思想革新着手于文学, 希望通过文学这种具有普世性的雅俗共赏的形式影响不同阶层的人, 尤其是下层缺乏教育的庞大人群, 达到开启民智, 促进社会转型, 助力维新伟业之目的。

梁启超对小说的重视源于社会改造的诉求, 但是, 东渡日本后他对小说才有了明确而具体的设想。梁启超在日本所从事的, 与思想文化和文学相关的主要工作首先是办报, 包括: 1898年12月在横滨由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 是他在海外办的第一份报纸; 1902年初创办《新民丛报》, 同样创办于日本的横滨, 是一份大型的综合性月刊; 1902年11月在横滨创办《新小说》。另外他翻译了不少文学的作品, 包括: 翻译柴四郎的《佳人奇遇》(发表于1898年的《清议报》)、《十五小豪杰》(转译自日本作家森田思轩的译作《十五少年》(1902年发表于《新民丛报》)是梁启超在日本最重要的两部文学翻译作品; 另外, 他还编译了法国文学家兼天文学家佛林玛利安所著的《地球末日记》(1902年发表于《新小说》)、署名曼殊室主人(法)的《俄皇宫中之人鬼》(1902年发表于《新小说》)两个短篇。这些文学翻译作品很快在国内引起热烈反响, 例如梁启超的《十五小豪杰》问世后不断重印, “至1930年上海书局已出至5版”。³⁴⁾刊载这篇小说的著名刊物《新民丛报》更是出现了一个销售小高潮。在梁启超译

32) 几道、别士, <本馆附印说部缘起>, 陈平原、夏晓虹编,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 第12页。

33) 康有为, <《日本书目志》时语>,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 1997年, 第29页。

34)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 第222页。

本的带动下，又出现了署名“远生”、“施落英”、“章士佼”几种不同的版本。由此可见这部小说的受众之广、需求之大。同时，以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掀起的“小说界革命”可谓小说史上第一次文学的剧烈变革。他还身体力行创作了《新中国未来记》，带动了政治小说创作热。总之，在以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的努力下“新小说”翻译与创作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总体观之，梁启超的译介活动贯穿其一生，所涉及范围非常广泛，他关注的重心集中于国家社会思想改造的领域。梁启超一生译介的西方书籍，有西方资产阶级学说，马克思主义著作等。可以说他的理想是：“抉破罗网，造出新思想。”³⁵⁾他非常渴慕：“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³⁶⁾的盛况。西方新的思想和学术流派由他译介到国内，对不少国外的大家他撰有专文评论。《饮冰室合集》涉及到的欧美、日本有影响的文化名人有50多位。例如：对卢梭(Rousseau)及其《民约论》的崇拜(《卢梭学案》)，精辟地总结了培根(Bacon)的研究方法和认识论(<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钦佩笛卡尔的怀疑精神(<近世文明初祖培根笛卡尔之学说>)，运用达尔文(Darwin)的进化论分析解决社会问题(<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形象生动地论述了康德(Kant)的道德和智慧学说(<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对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经济学理论佩服之至(《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推崇孟德斯鸠(Montesquien)的法理学说，认真研读他的《万法精理》等。梁启超也是迄今所知最早译介马克思学说的第一个中国人。1902年，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1903年发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介绍社会主义，他敏锐地预感到“社会主

35)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上海：中华书局，1989年，第65-67。

36) 同上注。

义为今日全世界一最大问题。”³⁷⁾ 梁启超借助报刊杂志小说论著等现代传播方式, 将新的词汇、概念、思想输入国内, 真正实践了思想革新的理想。正如 <论译书> 中说道: “处今日之天下, 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³⁸⁾ 通过这些外来思想文化元素的引进, 国人在语言、思维方式、价值观等方面必将受到深刻的影响。梁启超贡献不止限于翻译外来著作, 他本人的创作更是浩如烟海。他自己的著作更能体现其维新的思想主张。为维新变法而做的 <变法通译> 强调教育与变法同等重要, 并促成京师大学堂的成立。<释革> 诠释革命内涵, 辨析了Reform和Revolution两个词的异同, 对于年青梁启超来说渐进改良和暴力革命都是可以接受的, 他呼吁以政治革命为先导带动各个领域的革命。总之, 梁启超企图为改革设立一个大的思想前提, 即革是天演之公例, 社会进化的规律与自然界优胜劣汰是同质的, 但是人可以主动应对这种必然, 变革才能图存。1899年发表他的 <中国魂安在乎>, 肯定了“日本魂”, 遗憾中国“无魂”的历史, 提出“中国魂”, 据上下文理解, 梁启超盼望的是以爱国、勇敢、坚毅为核心的军人般的品格。梁氏尤其关注“爱国”的问题: “爱国之心薄弱, 实为积弱之最大根源”³⁹⁾ 此后梁启超撰有大量文章论及民族精神的问题。在中外比较的视野中, 梁启超愈发认识到国人本身的问题, 重建民族精神自然成为梁启超后续的工作。1902年, 他出版了《中国魂》一书。书中包括 <少年中国说>, <呵旁观者文>, <中国积弱溯源论>, <过渡时代论>, <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 <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 <论进取冒险>等文章。此书引起强烈反响, 短短5年时间就再版16次。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放置于全书

37) 梁启超, <新大陆游记>, 《新民丛报》第6期(1902年), 第4页。

38)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 第 222 页。

39) 梁启超, <中国积弱溯源论>, 《饮冰室合集·文集(五)》,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年, 第14页。

首篇的《少年中国说》，梁启超以少年喻中国，认为清政府虽然垂垂老矣，但是，迈向近代化的中国正值少年，充分表达了对中国民族精神重建的信心。他进而提出，要改变中国“老大帝国”的形象，需要全体国民的共同努力，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国家之老壮都与国民的精神状态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蕴藏了梁启超的宏伟蓝图——重启中国历史进程，希望能抛弃几千年沉重的历史包袱，轻装前行，将中国纳入世界历史的轨道，走向成为一个先进的现代国家的目标，全体国人自然成为这一目标的征服者和新历史的主角。梁氏将思想革新的第一步工作设定为“新民”，《新民丛报》的办报宗旨就是“维新吾民”。他全方位地建构了理想国民的图景。1904年他写成《中国之武士道》一书，日本举国尚武的社会风气激发了梁启超对武士道的关注与热情，他希望籍此书为中国梳理出一个与明治武士道相抗衡的中国武士道历史，在《论尚武》一文中，他指出孔子之教主张文武并重。梁启超提倡武士道精神实质是希望强国、强民，唤起民族精神。虽然，为重建中国付出智慧和心血的人绝不止梁启超一人，但是他做出的贡献是不可取代的，他的学说对于近现代转型期的中国影响无处不在，因而深入理解梁启超也是理解近代社会时代精神转变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陈泽环教授在对梁启超的研究中指出：“大致来说，其人生观可分为两期：从青少年的求学时代到参与戊戌维新运动，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撰写《新民说》为前期；之后经过辛亥革命回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考察欧洲直至逝世则为后期。”⁴⁰⁾ 这样的论断还是比较符合梁启超思想生活变化的，梁启超的前半生基本是四处奔走，为实现其政治理想上下求索，对于国内思想文化的更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他游历各

40) 陈泽环，《未来属于孔子——核心价值与文化传统之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0页。

国,考察国外民族历史、社会制度、风土人情,目的是通过思想革新,实现重建民族国家的理想。梁启超引入外来新思想、挖掘民族传统文化、以理性科学的思维进行优劣的辨析,这种研究就是一种具有近现代特征的学术行为和政治文化活动。梁启超在世界视野下,面向未来,以知识分子的方式重塑时代精神,在举国“群盲”、“群聋”、“群怯”的迷茫中,他以极具探险家气质的精神进行着怀疑、挑战、尝试、修正、再尝试的探索活动;以雕塑家般的创造力努力塑造具有时代新质的思想内涵,勾勒出时代精神的走向。可以说他和他的学说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形成过程中留下了不可抹去的印记。

第4節 探索精神的文学表达: 新小说

“新小说”是晚清“小说界革命”的产物,具体而言,源于1902年11月14日创刊的《新小说》。此前,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刊词〈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对“新小说”之义加以阐发,此文开篇即断言:“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结尾又称:“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⁴¹⁾“新民”乃是梁启超其时的中心关怀,“新小说”于是作为“新民”之道的辅翼⁴²⁾而登场。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看重的是“新小说”的启蒙教育功能,将小说当做教科书,主张采用白话俗语体,更重要的是内容和理念的革新。梁启超以“新民”思想提倡新小说,超越了小说英雄、儿女和鬼神的传统类别。概括讲,《新小说》预设的栏目主要有历史小说、政治小说、哲理科学小

41)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原文未署名。

42) 夏晓红,〈晚清“新小说”辨义〉,《文学评论》第六期,2017年,第5-15页。

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探侦(后改为“侦探”)小说、写情小说、语怪小说,而实际发表的作品超出了这一范围。小说种类迅速增加,涉及题材五花八门,全部体现一个“新”字。袁进将晚清小说分为四类:一类是鼓吹宣传政治主张及民主、自由、科学等新思想的小说;一类是揭露时弊,谴责满清政府腐败,也包括谴责维新党人营私的小说;一类是传统题材,供人消遣的小说;一类是模仿外国小说的题材,但实际上也是供人消遣的小说,如侦探小说。⁴³⁾其中数量最多的是谴责小说,但是谴责小说难以体现“新小说”之“新”,实际上新元素比较多的是受到西方文学影响的政治小说、科幻哲理小说和侦探小说。“新小说”理念所张扬的时代精神更容易寄生于这几类小说中。正如1905年《新小说》之“小说丛话”栏目中所言:“中国小说之不发达,犹有一因,即喜录陈言,……。然不久之方,必自输入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始。盖中国小说全无此三者性质,而此三者,尤为小说全体之关键也。”⁴⁴⁾梁启超为小说革命创办的文学杂志《新小说》创刊号首篇新小说是“雨尘子”的《洪水祸》。据说该作“一读已使人政治思想油然而生”。第二篇是“羽衣女士(罗普)”的《东欧女豪杰》,作品明确地引导读者去联想中国现实。第三篇便是标为“政治小说”的《新中国未来记》。在大篇幅的辩论和演讲中发表了对当前国家问题和政体问题的看法,并且不太生动地描述了立宪六十年后“新中国”的景象。小说界革命开始所倡导的实际上就是此类以未来预想为模式,以政治主题为核心政治科幻类小说。

探索是现代社会的的重要精神特质之一。探,试也。(《尔雅·释严》)索,求也。(《小尔雅·广言》)⁴⁵⁾探索释义为多方寻求答案,研究;搜查。⁴⁶⁾

43) 袁进,《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4页。

44)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第83页。

45) 《汉语大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1404页。

46) 《汉语大词典》(6),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第719页。

本文所指探索精神包含了：怀疑、发现、冒险、寻找、开拓、发明、创新之具有时代特色的含义。晚清“新小说”有两个核心的元素：科技与政治。这与“新小说”产生的两个大的历史背景有关：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林则徐、魏源、曾国藩、李鸿章和张之洞等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是技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以及孙中山等均反对“中体西用”认为中国问题的关键是政体。这样的问题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讨论，自然也成为“新小说”写作的重心。无论是追求真实感的政治小说，例如《新中国未来记》、《新中国》等，抑或是推崇科学哲理的小说，例如《新石头记》、《新纪元》、《月球殖民地小说》、《未来世界》(春帆)，尽管其中思想轨迹复杂、语调驳杂，小说的叙述最终聚焦于强国之路的探讨。有拥护立宪者(《新中国未来记》、《新中国》、《月球殖民地小说》、《电世界》、《未来世界》等)，也有反对立宪者(《立宪万岁》)，有崇尚新科技新文明者(《电世界》)，也有在新旧文化中纠结、对立宪心存疑虑者(《新石头记》)，甚至有直接提倡革命者(《狮子吼》、《黄绣球》等)，更有超越了立宪和革命进入个人绝对自由主义者(《新年梦》、《极乐地》)。小说对于这些问题的表现非常直接，基本上是由作品中人物的对话和叙述者的议论来完成，由于对话和议论占据了大部分篇幅，冲淡了小说应有的故事性，忽略了生动的人物形象塑造及情节和场景的描绘。无疑，这样小说的艺术性和可读性降低了，但是先进知识分子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忧虑之情和追寻答案的积极思考跃然纸上。作者在亦真亦幻的理想空间中注入了丰富的晚清价值，投射了关于社会、教育、政治、医疗、商业、交通等多种内容。现实的种种弊端由未来世界先进的制度和新技术一一消除，塑造出“举国之民，戮力一心，从事于殖产兴业，文学之盛，国力之强，冠绝全球。”⁴⁷⁾的新中国。即便是被很多人认作消遣读物的侦探小说其实也不同于言

47)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第44页。

情、神怪式的消遣之作。当年侦探小说可谓“充塞坊间，而犹有不足以应够求者之虑。”在1906年上海广智书局版的《中国侦探案》弁言中记载了大众读者喜爱侦探小说的缘由，读者极其佩服侦探小说中的“思想之神奇”、“科学之精进”。⁴⁸⁾ 读者注目的是其中悬疑色彩、曲折的情节、侦探的智慧和缜密的推理，然而进一步分析，其中还有不少被忽略的独特内涵。例如：现代城市空间的书写，现代人际关系的思考，犯罪学、心理学、侦查手段的精彩描写，迷信的破除，法律知识的普及，侦探小说也一样充满科学民主的新理念，同样是“新小说”的重要成果。最先引入柯南·道尔探案小说的就是《时务报》。⁴⁹⁾

晚清“新小说”小说中活跃着一大批时代新人，即梁启超所谓“新民”。虽然作者只用很少笔墨去塑造这些新派人物，但是他们仍然体现了同旧式人物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透过人物的言谈举止和人生经历散发出来，凝聚为一种有别于封建时代的新时代精神。他们有感于国家的腐败落后，更痛恨外来的侵略者，他们不是身居庙堂的帝王、贵族、高官或圣人，而多数是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普通知识分子、绅士和庶民，他们身上有传统文化中“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精神，但更具感染力的是敢于突破传统，学习新知，充满自信，为寻求强国富民之道而四处奔走、上下求索的“新民”气质。其中有，设计新的救国方案的维新派的政治活动家，如黄克强、李去病(《新中国未来记》)，宁孙某、魏淡然(《痴人说梦记》)；推崇根本性变革创造新社会的革命派，如黎浪夫(《痴人说梦记》)、华永年、夏震欧(《瓜分惨祸预言记》)；宣扬各种新式强国理念的知识精英，如陆云翔(《新中国》)、“中国一民”(《新年梦》)、黄孙(《苦学生》)、唐蕙良(《月球殖民地小说》)；热爱现代科学的发明家，例如“电学大家”黄震球

48)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第194页。

49) 参见蒋林译，《梁启超“豪杰译”研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183页。

(《电世界》)、濮玉环(《月球殖民地小说》)、黄之盛(《新纪元》), 逐渐觉醒并向往新世界的旧式人物, 例如龙孟华(《月球殖民地小说》)、贾宝玉(《新石头记》)等。科学、理性、法制、公平的代言人, 如“东方福尔摩斯”霍桑(《霍桑探案》)、“侠盗”鲁平(《侠盗鲁平奇案》), 他们身上蕴含了作者对国家的现在和未来的深切关注和思考, 这个人物形象群集体呈现了相信未来的理想色彩。

这些人物形象显然不存在于传统小说中, 他们到处游历、学习新知、进行实验、彻夜讨论, 只为寻求强国强军和创造理想社会的方法。他们可以被誉为“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明者。他们耽于思索, 孜孜不倦, 敢于尝试, 放眼世界, 心怀天下, 以超人的智慧重塑新中国的美好形象。例如“苏汉民”(《新中国》)为让国人觉醒、纠正人心而发明了“医心药”和“催醒术”, “文初”(《新野叟曝言》)为了解决中国人多之患发明了飞舰想将人移植到金星、木星等星球上去, 他为人严谨, 一丝不苟。他奉命征欧得胜, 又飞上月球把中国的黄龙国旗竖立在山顶上, 表示中国人的自豪。“电气大王”创造了一个全部电气化了的大同世界, 其中充斥着千奇百怪的新发明, 同时, 他宣告了传统之“道”的远去, 并肯定了属于“进化论”的未来。显然, 真正科学家不只是技术的传承者和革新者, 更是拥有深刻的思想和远大理想的杰出人物。

在“新小说”中作者依据有限的科学知识展开超乎寻常的想象。描写了众多新奇发明, 涉及生活日用、医疗、农业、交通设施、军事武器、侦探技术等。例如:《电世界》中有“光电教育图象”、“电犁”、“电气肥料”、用以歼灭“拿破仑十世”之飞行舰队的“电气枪”, 《新中国》(陆士谔)中有“洗澡用化学汽”, “空中飞艇”、“空中自行车”, “水行鞋”, 还有用于捕鱼的“测水镜”、“听鱼机”、“电机船”, 用于采珍珠的“X光”, 《月球殖民地小说》(荒江钓叟)中硕大无比的能飞向太空的“气球”、威力无

比的“绿汽大炮”而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则在一场世纪大战中让精通热学和水文学的“黄之盛”带领着用现代高科技武装的军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其中的大气球、潜水艇已不新鲜，更新奇的是运用了“海战知觉器”、“海面探险器”、“日光镜”、“避电衣”、“流质电射灯”等二十多种新军事发明。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一方面反映了国人对改变积贫积弱现状的渴望，同时也显示了国人被压抑已久的创造力。

“民气者，国家所以自存之一要素也。”⁵⁰⁾“民气”是清末报章杂志上常见的一个词汇，也是梁启超《新民说》里一个论题，虽然梁启超没有对其做过概念的界定，但是它的含义相当于生命力、活力、意志，是附属于“新民”这一概念的，梁启超对其内涵做了三个限定：“民气必与民力相待，无民力之民气，则必无结果”；“民气必与民智相待，无民智之民气，则无价值”；“民气必与民德相待，无民德之民气，不惟无益反而有害。”⁵¹⁾他强调这种民气不是一种野蛮盲目的冲动，而是拥有必备的修养、物质基础和学识智慧的人内在的精神力量。个体民气的提升，最终会汇聚为强大的时代精神洪流。由此，可以理解先进知识分子引进西学的用心，不仅为国增强家的物质力量，更重要的是精神力量的提升。探索精神是以现代科学理性为依托的，自从19世纪末“科学”一词由日本进入中国，西学渐成主流，追求科学成为知识界的强劲潮流。科学思维成为人们各种研究和学术工作的基础，乃至踏上中学“科学化”的进程，以西学证明中学。梁启超的名著《清代学术概论》所张扬的其实就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解放思想、经世致用的科学态度，他深谙科学思想对中国发展的长远影响。科学的核心精神之一就是自由探索，它包含了在已有经验基础上的怀疑、思辨、尝试和预见等丰富内容，彰显了积极

50) 梁启超，《新民说》，第193页。

51) 同上注，第193-199页。

的态度和锲而不舍的意志。晚清人士倡导的勤于探索正是浸染了近代西方科学理性精神的结果。晚清“新小说”正反映了国人希望通过借鉴西学尝试解决中国的问题的积极心态，记录了时人努力共建时代精神的历史征程。

“天下”并非大清王朝这个封闭的空间，中国只是世界版图中的一个部分，中华民族的历史不再是循环往复的固定运程，而是有“他者”参与的现代化进程。在同样的时空坐标下，我们必须迎接外来的挑战，不能做被动的接受者，无论是教育、科学、军事要赶上世界脚步，甚至成为真正的“万国之首”，就必须主动寻求、创造。国人探索奥秘、追求新奇的精神，为“新小说”注入新的活力。文学家凭借探索的精神打开了文学的新空间；“新小说”又打开国人的想象空间，国人凭借积极探索的精神亦找到突破民族困境、打开局面的途径，创造着属于未来的新世界。这正呼应了梁启超的豪言：“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少年中国，与国无疆！”梁启超正是希望借“少年中国说”，在区分“朝”与“国”两个概念的前提下，建立一个新起点，从而开启一个新时代，创造一个新空间，这何尝不是一种探索精神？正因作家为捕捉到这种属于新时代的探索精神，“新小说”才拥有了独特的价值，它必将从文本的叙事空间延伸到现实世界，创造一个真正属于中国的未来。

▣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

碧荷馆主人,《新纪元》,章培恒、王继权等,中国近代小说大系,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胡适,《藏晖堂札记》,上海东亚图书馆,1939年。

儒勒·凡尔纳著、饮冰子等译,《十五小豪杰》,世界书局,1930年。

侯忠义等主编,《中国古代珍稀本小说》,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

梁启超,《新民说》,商务印书馆,2016年。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

夏晓虹,《梁启超文选》上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神州国光社,1954年。

E·G·波林著、高觉敷译,《实验心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

袁进,《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

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第一卷(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潘一禾,《西方文学中的政治》,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

耿传明,《决绝与眷恋: 清末民初社会心态与文学转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谢天振,《译介学》,译林出版社,2013年。

陈泽环,《未来属于孔子--核心价值与文化传统之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颜健富,《晚清小说的新概念地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

梁启超,〈本报告白〉,《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8日。

梁启超,〈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8日。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新民丛报》第6期,1902年6月。

端木蕻良,〈《十五小豪杰》和我〉,《民主》11期,1995年11月。

欧阳健, <晚清新小说的生成和价值内涵>,《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3期, 1997年6月。

范苓, <翻译文体的选择与创新--明治言文一致文体对梁启超的影响>,《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2卷第3期, 2009年5月。

陈大康, <论“小说界革命”及其后之转向>,《文学评论》第6期, 2013年12月。

王彬, <科幻探险中的家国梦--论梁启超《十五小豪杰》翻译中的伦理建构>,《中国翻译》第1期, 2016年1月。

韩钊, <清末时期梁启超“民气”论研究>,《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9卷第1期, 2016年1月。

夏晓红, <晚清“新小说”辨义>,《文学评论》第6期, 2017年12月。

杨念群, <重建“中华民族”历史叙述的谱系--《重塑中华》与中国概念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第5期, 2018年10月。

〈Abstract〉

Liang Qichao's Promotion and Shaping of the Exploring Spiri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New Novels

Sun, Lixiu · Oh, Soonbang

The advanced intellectuals represented by Liang Qichao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people and the shaping of national spirit. Liang Qichao tried to revive the national spirit of the new era with the help of foreig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nd personally written works. He put forward “New People” as the core concept of the times, he emphasiz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on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he hopes to introduce the ideology and culture of advanced countries such as Europe, America and Japan to stimulate the active elements in the national culture, and he especially admires modern political ideals and scientific spirit. The “new novel” actively advocated by Liang Qichao carries the Chinese people's urgent desire to change the backward status quo and the desire for the ideal social form. Examining the “new novel” can reveal that it contains rich information such 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s ideological concept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especially the enthusiasm and faith of advanced people who are diligent in exploring new ways and bravely opening up new worlds. This approach breaks through the old connotation of traditional literature and creates a new world of literature.

Key Words : Liang Qichao, “the late Qing Dynasty; new novel”,
explore,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new people

이 논문은 2019년 10월 30일에 접수되어 11월 26일에 심사를 완료하고
12월 14일에 게재 확정되었습니다.